

区域国别学专题

## 区域国别学还是区域国别学学？

——对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动态的一点思考

叶海林 吴俊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一级学科以来，学科建设显著加速，形成了全国性的“区域国别学热”，并围绕学科建设产出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当前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趋向之一是构建统一且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这一趋向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作为紧密依靠差异化知识和个案研究的新兴学科，区域国别学过早理论一般化和方法普遍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学科的长远健康发展。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中国面对自身发展模式演进、国际格局变动及对外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对区域国别知识的巨大现实需求。作为以客体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新兴学科，区域国别理论的发展不能偏离解决知识稀缺、提供知识产出为主的方向，更不能在知识产出任务还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就急于求成，人为“催熟”学科理论体系。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应肩负起培育具备全球视野、中国底色、对象视角的复合型人才与产出研究成果的时代任务，秉持“身体在场”的学术理念和游学传统，不断推出真正服务于现实的优质知识产品，坚持在知识生产中同步推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学科建设 知识生产 田野调查 游学传统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吴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5) 02-0024-21

新兴技术革命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使得传统上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分支的区域国别研究及其传统研究范式难以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做出具有战略指导价值的回应。西方学界长期垄断区域国别研究的话语权，其长久的“东方主义”视角将非西方文明简化为被观察的客体，导致知识生产中呈现严重的话语权失衡。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全球治理参与者，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快速提升，海外利益不断扩大，亟须构建能规避西方认知陷阱、服务中国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成为新兴的交叉学科。虽然一级学科的设立催化了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热烈讨论并产生了初步成果，特别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范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在关于研究对象国的知识生产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匮乏，优质的具象化研究成果依旧不敷需求，特别是缺少在全球大变局下立足中国战略，对中国与区域国别研究对象之间关系展开前瞻和复合研究的成果。同时，还需要看到，当前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还出现了重通用理论和普遍方法、轻具体认识和田野知识的倾向。这种倾向虽然尚未冲击到区域国别学的健康发展大趋势，但学术界应及早引起重视，做出一定反思，努力回答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如何坚持“初心”、始终符合时代需求的发展方向这一基本问题。

## 一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与反思

区域国别学的迅速兴起既是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战略选择，也是满足国家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知识需求的主动谋划。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学科建设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挑战与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国别学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以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而推进学科健康发展。

### （一）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成果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9月被正式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来，学科建设进入快车道，形成全国性的“区域国别学热”。2024年1月，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进一步明晰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涵与边界，构建起包含理论方法、区域比较研究、全球治理等六大方向的二级学科框架，标志着中国区域国别学标准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在政策牵引与资源倾斜的双重驱动下，学科成果呈现体

系化突破。

第一，高校智库与人才培养体系加速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覆盖186所高等院校，形成“双一流大学引领、地方高校特色支撑”的立体化布局。在人才培养层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顶尖学府率先开设博士培养项目，已向政策研究机构、国际组织输送首批复合型人才。在学科机构建设方面，超过30所高校设立了独立研究院（中心），其中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完成自主设置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创新实践，逐步构建起“学科建设—智库服务—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sup>①</sup>

第二，学科交流平台与学术共同体快速搭建。中国高校区域国别学共同体建设始于2019年：在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指导下，中山大学牵头成立国内首个校际学科协作平台——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该联盟已构建起覆盖学科建设全要素的生态体系：成员单位涵盖122所高校的200余家机构，其中包含55所“双一流”高校以及14所外语类、18所师范类等特色院校，学科跨度涵盖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十余个一级学科。作为学科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成果，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于2024年发布国内首份《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基础竞争力评价报告》，通过对全国参评研究机构的系统评估，遴选出22所“A+”和“A”级标杆单位，为学科发展树立了评价参照系。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壮大，标志着中国区域国别学从分散探索走向资源整合的系统化发展新阶段。

第三，学术发表渠道明显扩展。作为学科知识生产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类期刊种数近年快速增长，并呈现出“区域聚焦”与“跨学科融合”的特征。在区域聚焦方面，清华大学《南亚学》（2022年）、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学》（2023年）、云南大学《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西北大学《南亚问题研究》（2024年）等刊物相继创办，深度锚定东南亚、南亚等关键地缘板块，形成以区域为核心的专题化研究集群。跨学科融合则体现为学科边界的突破与知识生产范式的重构：南京大学《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以历史学、政治学交叉视角解析区域治理；中山大学

<sup>①</sup>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网站。  
<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2025-03-05]

《区域史研究》（2019年）联合九校学术共同体，通过历史维度解析区域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更以智库功能整合人类学、发展经济学与中非关系研究，推动学术成果向政策实践转化。<sup>①</sup> 此类刊物既包含商务印书馆、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集刊（以书代刊），亦涵盖纳入正式期刊体系的学术阵地，覆盖了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全球重点区域，构建起“区域本体+学科交叉”的双轮驱动模式，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研究支撑与制度化传播平台。

第四，中国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增长显著，相关著作与论文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在学科基础教材建设方面，自2019年以来，十余部教科书式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逐步深入。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系统梳理学科发展历程、核心内涵与理论框架为主要内容，同时结合重要区域与国家的研究现状与对策分析。这一类的代表性成果包括郑春荣主编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实务》（2024年）、郭树勇主编的《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2019年）、王健主编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导论》（2023年）、王逸舟主编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2021年）、赵可金主编的《区域国别学》（2023年）等。另一类则注重方法论的探索与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聚焦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体系的建构。这一类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张蕴岭主编的《国际区域学概论》（2022年）、吴小安主编的《区域与国别之间》（2021年）、杨丹主编的《区域国别学：全球视野》（2023年）、罗林主编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2023年），后者收录了近年来国内主要学者关于理论范式、学科建构与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学术论文产出呈指数级增长。据中国知网统计，在2019—2021年期间以“区域国别学”为篇名的论文数量累计仅3篇；2022年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正式确立后，相关论文数量迅速增长，2023年达118篇，2024年突破163篇，2025年预计将达198篇。研究主题也逐步从早期聚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向区域专题研究与理论创新转型。这一知识生产结构的转变既得益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等政策文件的规范引导，

<sup>①</sup> 近年来创刊的学术刊物还包括：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1年），原刊为2017年创刊的《区域国别研究学刊》；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主办的《区域国别学》（2022年）和《田野调查》（2023年）；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主办的《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原刊为2017年创刊的《区域与全球发展》。

也受益于高校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跨学科研究平台的资源整合。

## (二) 区域国别研究的热点分析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以“区域国别学”为主题词,考察截至 2025 年 4 月前发表的相关“三大核心期刊”(即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与 AMI 核心)所收录的文献,共获得 270 篇基础文献。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该数据进行预处理,去除卷首语、主持人语等非学术文献,最终获得 232 篇有效文献。下面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关注点和发展趋势。

由表 1 可见,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主频词包括“交叉学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外语学科”“区域研究”“区域国别”和“中国特色”。其中“交叉学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心性分别为 0.28、0.24 和 0.22,频次分别为 22、22 和 17,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是区域国别学的热门议题。

表 1 区域国别学关键词的中心性、出现年份、出现频次列表

关键词	中心性	首次出现年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首次出现年	频次
交叉学科	0.28	2022	22	世界政治	0.00	2023	2
学科建设	0.24	2022	22	东南亚学	0.00	2023	2
人才培养	0.22	2022	17	东方学	0.00	2023	2
外语学科	0.07	2022	11	中国	0.00	2022	2
区域研究	0.12	2022	8	人类学	0.00	2023	2
区域国别	0.02	2023	7	共同体	0.03	2023	2
中国特色	0.03	2022	5	国际传播	0.00	2025	2
学科交叉	0.05	2024	4	国际政治	0.00	2023	2
学科体系	0.01	2022	4	国际比较	0.01	2023	2
方法论	0.05	2023	4	地理学	0.02	2025	2
全球治理	0.00	2024	3	外语教育	0.00	2024	2
国家战略	0.00	2023	3	学术体系	0.07	2022	2
学科发展	0.00	2024	3	学科构建	0.00	2023	2
田野调查	0.10	2022	3	新文科	0.00	2022	2
话语体系	0.00	2022	3	机制创新	0.02	2023	2
一级学科	0.00	2023	2	涉外法治	0.00	2024	2
世界史	0.03	2023	2	知识体系	0.01	2023	2

注:表中未列出出现频次为 1 的关键词。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将表 1 的关键词按照相近的特性进行分组，通过 CiteSpace 的聚类处理，显示出学科建设、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区域研究与田野调查五大聚类群。其中，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 Q）=0.7601，平均轮廓值（Sihouette）=0.9409，表明我国区域国别学的聚类分析结果可信度高。<sup>①</sup>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征词聚类（LLR）算法的分析结果，提取出各主题所对应的高频特征词，并据此揭示当前研究关注的核心主题（见表 2）。

表 2 区域国别学相关研究主题（部分）

主题	节点数量	平均轮廓值	年份	特征词聚类（LLR）
学科体系	15	1.000	2022	学科体系 交叉学科 学科构建 学术体系 知识体系
人才培养	14	0.954	2023	人才培养 区域国别 培养模式 三大结构性问题 咨政作用
区域研究	12	0.982	2022	区域研究 外语学科 共同体 五度融合 社会科学
学科建设	12	0.740	2023	学科建设 整体性知识 机制创新 英美发展 区域国别理论
田野调查	7	0.991	2024	田野调查 地理学 尺度陷阱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人类学
学科交叉	4	0.990	2024	学科交叉 知识生产 外层空间 高质量教育体系 国际战略
中国特色	4	0.982	2023	中国特色 共生理论 学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 学科评价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 （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反思

不可否认，学界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过程中已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尤其在学科建设、构建理论框架和探索理论范式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这些努力不仅回应了学科体系化建构的迫切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地位与话语权，推动其逐步向更高层次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存在着“过早理论一般化、方法普遍化”的问题，从长远看可能产生不利于学科健康发展的消极后果。

第一，中国的区域国别基础知识产出尚未满足当前需求，急于构建所谓

<sup>①</sup> 一般认为，“Q 值 > 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 值 > 0.5”是合理的，“S > 0.7”意味着聚类令人信服。

的学科理论反而可能占用原有的知识生产渠道。就目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而言，首先需要有一批高质量的描述性知识产品，向学术研究需求方提供对象国和地区的实际情景。这类知识产品可能不需要太深入的分析，但基本要求是系统、客观、真实。最近 10 年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规模扩大，专业知识生产者大增，但整体而言专业知识生产仍远远跟不上需求。<sup>①</sup> 如上文统计，在国际问题研究类核心期刊数量未变的前提下，关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论文数量连年增长，实际上挤占了原有区域国别研究期刊的版面，抑制了区域国别类知识的生产。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弥合巨大的供需矛盾，只有持续进行量大质优的初级知识生产，才能形成实践发展的良性反馈并实现最终的理论建构。

第二，区域国别学发展如果过分执着于对概念和学科体系的界定，有可能忽视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回应现实世界对知识生产的实际需求，背离学科升级调整的初衷。如江时学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有六十余年历史，相关研究已逐步去除神秘化，形成了常态化、系统化的学术格局。相较于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外交等传统综合性学科，区域国别学研究难度并不更高。因此，学术界应超越对区域国别学定义、边界及其重要性的重复论述，转向更加关注知识产出的实质性问题。<sup>②</sup> 当前学科设置中的一项突出问题在于对研究单元与学科层级划分的定义争论非常激烈，纠结于二级学科划分的数量和方法<sup>③</sup>，而现实中并不具备可准确界定的实操性。例如，关于区域国别学科层级划分，区域国别学无论如何分类，最终仍需落实到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否则便失去了“区域国别”之本义。然而，若仅依照地理区域进行学科层级划分，则容易出现下位研究领域反而比上位学科更具理论与方法深度的情况。例如，在南亚研究中，“印度学”究竟应归入“India Studies”还是更具文化人类学色彩的“Indology”？后者作为源于西方学术传统的研究门类，其研究

<sup>①</sup> 谢韬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载《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28 页。

<sup>②</sup> 江时学：《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认知》，载《拉丁美洲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25 页。

<sup>③</sup> 参见李晨阳：《再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载《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8 期；赵可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布局》，载《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载《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2 期；陈岳：《区域国别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载《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戴长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载《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

广度和深度远超常规意义上的地区研究范畴。这种情况下，若将“Indology”作为“南亚研究”下的三级子类，反而使上层学科显得空泛，甚至造成“层级倒挂”的悖论。同样，若“印度学”被单独划出，又势必削弱“南亚研究”的完整性，形成学科结构上的断裂。类似的问题亦出现在“跨区域研究”概念上。当前对“区域”这一术语本身尚无统一界定，而“跨区域”的内涵更趋模糊，它究竟指的是对两个既定区域的比较研究，还是试图打破原有的地理界限，构建新的理论框架？这种概念分歧并非纯学理性问题，而是直接与国家战略及政策实践相关联。例如，美国提出“印太”概念，本质上是对传统“太平洋”与“印度洋”分区的重构，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图，这一概念已在国际认知体系中产生了实际影响。如何回应这类政策性话语，已成为区域国别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构初期，毋须拘泥于人为设定的学科等级或主导学科划分，而应以知识生产的真实需求为导向。凡是能提供系统性、可验证、具政策相关性的研究成果，皆应视为该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其所依托的方法论或学科背景为何。<sup>①</sup> 惟其如此，区域国别学才能真正实现从“学科设立”向“知识生产”的有效转化。

第三，区域国别学若执着于构建统一且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过早抽象化和一般化，反而可能抑制学术生态的繁荣景象，不利于学科的健康生长。不少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一级学科，需要与之匹配的知识、理论、方法、实践的系统性建设，才能走向真正意义的成熟。<sup>②</sup> 王缉思认为，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资源与物质条件方面已有明显改善，但仍面临理论创新不足和跨学科融合不充分的问题。<sup>③</sup> 李晨阳也认为，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了长期探索，但整体上仍显得不够成熟与系统。<sup>④</sup> 周方银提出，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仅作为社会科学的素材来源，而需构建独立、系统的基础理论，强化学科的共通知识积累。<sup>⑤</sup> 李巍认为，作为新兴学

① 秦亚青：《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第9页。

② 翟崑：《推进区域国别学规范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https://www.cssn.cn/qygbx/202402/t20240223\\_5734557.shtml](https://www.cssn.cn/qygbx/202402/t20240223_5734557.shtml)。[2025-03-10]

③ 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8年第73期。[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2776940&from=kuaibao](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2776940&from=kuaibao)。[2025-03-10]

④ 李晨阳：《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2期，第73页，第24页。

⑤ 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载《亚太安全与海洋》，2022年第3期，第18-28+2页。

科，区域国别学亟须向既有成熟学科借鉴理论资源，以构建统一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增强自身的竞争力。<sup>①</sup> 谢韬等也认为，没有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sup>②</sup> 针对中国区域国别学缺乏学科理论与方法范式的现状，众多学者积极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知识体系。如刘泓武认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不是西式的殖民帝国之学、霸权强权之学，而是融汇人类各区域、各国家、各民族文明成果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知识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学”。<sup>③</sup> 谢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可以启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创新，即通过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复制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无论是小样本的历史比较还是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异同，进而开展因果推理，最终进行理论构建。<sup>④</sup> 曾向红尝试用“焦点—场域”的方法论，解释区域国别学视野中的区域和国家。<sup>⑤</sup> 卢光盛则提出，应以“共同体”为内核构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共同体范式”，以此推动学科“化多为一”，收摄多层次具体研究对象，兼顾普遍与特殊知识，调节“学”与“用”的平衡。<sup>⑥</sup> 此类理论探索成果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学术界对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对于保证学科的长期健康发展方向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也要注意，当前区域国别学界在构建技术性理论与一体化研究范式方面，存在着急于理论化、力求建立独立理论体系的倾向。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一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和建设意义。然而，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现阶段的理论积淀尚显不足，且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在当前阶段过早追求统一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并不符合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可能对区域国别学的成长造成消极影响。与既有传统学科不同，区域国别研究更强调特殊性知识，反对过度抽象化与理论普遍化。

① 李巍：《区域国别学：一门大国独有的学科》，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34页。

② 谢韬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6页。

③ 刘泓武：《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与推进路径》，载《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3期，第51页。

④ 谢韬：《区域国别研究：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46页。

⑤ 曾向红：《论区域国别学中的焦点—场域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5期，第48页。

⑥ 卢光盛、王子奇：《“共同体范式”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载《云大地区研究》，2022年第1期，第15页。

该领域更侧重于对特定国家与地区“情景”与“地方性知识”的深入理解，而非依赖一般性理论解释复杂社会现象。区域国别学研究在理论一般化过程中，应避免“重理论、轻现实”的倾向，以免导致对具体区域或国家认知的严重失真。<sup>①</sup>因此，当前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应优先强调田野知识的积累、语言能力的培养以及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引入与运用。在尚未形成足够区域经验与知识储备的阶段，若仓促推进理论化、统一化，可能扼杀学科潜在的多样性，限制其未来的发展空间。

此外，当前各学科竞相主导区域国别学话语权与研究范式的趋势，实则偏离了该学科强调跨学科融合与协同发展的根本理念。若延续由单一学科主导的理论建构路径，势必导致区域国别学被囿于既有学科的理论范式之中，进而严重制约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创新的可能性。学科的设立应该服务于人的认识活动需要，而不是束缚人的认识活动或支配人的认识活动。<sup>②</sup>换言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应坚持“先经验、后理论”的路径：应该允许先进行“野蛮生长”，后开展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先关注“树木”的培育，再进行“森林”的规划。在这一过程中，应强调做“区域国别学”，而非急于建构“区域国别学学”。

## 二 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设立的动因与时代使命

正如上文分析，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优先事项不是学科的理论化，而是基础知识的生产。这一判断不仅是基于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更是来源于中国区域国别学设立的初心，即中国自身面临发展模式、国际格局和对外战略转变的客观现实需求。与之相应，要满足以上客观现实需求，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需要肩负起培养具备全球视野、中国底色和对方视角的人才，以及产出与变局时代新兴大国全球崛起相适应的学术成果的时代使命。

### （一）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设立的动因分析

中国正式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标志着这一交叉学科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这一举措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现实发展的迫切需

<sup>①</sup> 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25页。

<sup>②</sup> 刘泓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54页。

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仍存在学科设置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问题。<sup>①</sup> 将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设立为一级学科，既回应了上述时代挑战，也契合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客观需求。

第一，中国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需求。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深刻转变。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sup>②</sup> 这一重要论述再次强调了中国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客观需求。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求中国更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实现从“世界工厂”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升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成为新常态，大批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赴海外投资经营，开拓国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充分了解东道国的国情与风险，成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应对的课题。区域国别学正是为了解决上述课题而提供知识支撑的关键学科。它以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等领域的深入研究为基础，专门研究各国国情和区域形势。中国企业在非洲、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地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展经贸合作时，需要充分评估当地的政治稳定性、法律环境和文化习俗差异。这就需要具有该地区专业知识的人才和智库提供决策咨询，避免类似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遭遇“天价罚单”的惨痛教训。

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开放的“优进优出”需要精准掌握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动态，这就提出了与之高度契合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智力支持要求。在此背景下，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建立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了人才支撑。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致力于培养既通晓国际规则又精通某国国情的复合型人才，以服务于企业海外拓展和政府对外合作。例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强调，高校应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实现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双赢。他以该校非洲研究院为例，探索构建“产学研企政”一体化模式，使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直接服务于国家和地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政府网，2024 年 7 月 18 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2025 - 03 - 15]

<sup>②</sup>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载《求是》，2024 年第 12 期。

方经济社会发展。<sup>①</sup> 区域国别学设立的初衷就是要培养一批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和企业“出海”的高端人才，深入对象国开展田野调查，为企业提供投资风险评估和经营建议。事实证明，在中国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阶段，需要区域国别学提供的国别信息、政策建议和风险评估，为确保“走出去”战略行稳致远提供重要支撑。

第二，中国应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客观需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一方面，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挑战，全球权力中心趋向多元化；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调整。在这一历史剧变中，中国既处于自身发展的最好时期，也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指出：“中国现在所处的时期是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sup>②</sup> 这两大趋势交织并进，既为中国提供机遇，也带来挑战。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迫切需要增强对外部世界的深度认知和研判能力。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更加凸显。中国要在变化的国际格局中掌握主动，离不开对各地区形势的透彻研究以及对全球治理议题的参与规划。当今国际关系中，“全球南方”地位日益上升，已崛起为一支独立且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全球南方成为中国与西方长期竞争、推动世界多极化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重要战略支点。<sup>③</sup>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和合作倡导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同时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系起来，意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命运与共的新格局。这不仅要求通过区域国别研究及时把握全球南方国家的关切与诉求，还要求借此能够构建起自主的对外知识体系，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演变规律。正如姜锋所言，未来区域国别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国家发展、对外战略和文明交流提供服务；其次是培育国民的全球视野，让公众具备大国公民的素

<sup>①</sup> 刘鸿武：《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与推进路径》，载《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3期，第60页。

<sup>②</sup> 习近平：《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新华网，2019年9月25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5/c\\_1125037538.htm](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5/c_1125037538.htm)。[2025-03-16]

<sup>③</sup> 赵可金等：《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南方”》，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2-26页。

养。<sup>①</sup> 由此，区域国别学既服务国家，也助力社会，对中国应对国际格局演变具有双重意义。

在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剧变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也对区域国别知识提出了更高需求。比如，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方面，中国需要了解不同国家的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时，也需要区域研究专家协助开展国际合作。因此，无论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新理念，都需要大批精通不同区域的专门研究人才来落实。可以说，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角色转变对区域国别学提出了客观要求：既要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学理支撑，也要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公共产品。这一需求反过来促使我国加快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通过制度化培育和研究，积累关于世界各区域的知识储备，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第三，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客观需求。中国对外战略在近年经历了显著调整，从过去以韬光养晦为主的方针，转向更加积极有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战略转型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变化：从跟随国际规则到更多参与甚至引领规则制定，从聚焦自身发展到更多承担国际责任。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宣示了中国外交的新愿景。为实现这一愿景，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和倡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机制，以及上述有关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的提出。这些战略调整要求中国更有效地协调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因地制宜开展外交实践，从而对精准的国别区域知识形成了现实需求。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更加强调风险管控和可持续合作。过去十年里“一带一路”共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某些国家政局动荡、债务风险、文化误解等挑战。面对这些问题，中国需要依托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的专业分析，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保驾护航。正如翟崑教授所言，“一带一路”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是“学用相生”。“一带一路”建设催生了区域国别学，“一带一路”这一人类命运共同

---

<sup>①</sup> 姜锋在“区域国别研究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https://iir.sass.org.cn/2024/1023/c438a573832/page.htm>。[2025-03-16]

体的重要实践需要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包括顶层设计的调整、战略框架的完善、政策体系的对接、项目模式的改造、资金支持的融通、风险管理的创新、智力支持的巩固等多个方面。<sup>①</sup> 例如，针对中亚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国在推进中亚天然气管道等项目时，需要区域研究专家就当地的族群关系、土地资源占用等问题提出风险管控建议。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需要深入研究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态和安全局势，以助力合作项目的优化和推进。区域国别学科培养的人才和研究成果能够为这些外交战略调整提供可靠支撑。

其次，中国在周边外交和大国关系上也进行着策略调整，更加注重精准施策和分类合作。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方向是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伙伴关系取代阵营对抗的外交新思路，这要求摆脱传统外交中过于泛泛而谈或简单套用普遍模式的局限，转向精细化、差异化的对外合作策略。区域国别学正是支持这种差异化外交的基础性学科。通过区域国别学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识别不同国家的利益关注点、战略优先事项和决策逻辑，进而找到最有效的合作切入点，避免因对合作对象国的了解不充分而产生外交误判。

最后，随着中国对外利益的扩展和海外公民、企业数量的增加，保护海外利益已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近年来，诸如在中东地区的撤侨行动、海外投资项目的安全事故等，都提醒我们加强海外风险研判和预案制定的重要性。中央文件多次要求提高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能力，将预防和化解各类涉外风险摆在突出位置。这些都离不开区域国别学提供的风险信息和对策研究。这种案例分析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屡见不鲜，从拉美国家的政治选举对中资企业的影响，到中东地区地缘冲突对能源通道安全的威胁，区域国别专家的研判可为国家外交决策和企业经营布局提供宝贵参考。可以说，中国对外战略越趋主动和多元，就越需要区域国别学的支持来实现“知己知彼”。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无论在倡议层面还是在具体国别层面，都对知识和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保障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能够“谋定而后动”。它一方面为国家战略谋划提供前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学科培养为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

---

<sup>①</sup> 翟崑：《区域国别学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1期，第8-9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有着紧密的关联。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区域国别学提供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持，帮助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优化对外经济合作布局；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中国对外战略的积极调整，更加凸显了对国别区域知识的迫切需求。无论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共建和“走出去”战略，还是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区域国别学提供知识支持和人才支撑。

##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一级学科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的创举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战略重视与时代需求，更彰显了该学科承载的重大历史使命。作为应运而生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应具备全球视野、中国底色和对方视角。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全球视野”，培养“大小结合”的复合能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sup>①</sup> 需要超越“本国优先”的狭义视角，从世界的宽广博大体会人类的命运与共。2020 年 6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也要求：“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做区域国别研究，当然需要看到全球的“大格局”，但不是悬在空中不接地气而奢谈战略。具体来说，研究者必须明白，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紧密关联，必须先从大的框架看问题。但区域国别研究真正的难度和价值是“见微知著”，具体到某个国家或某个热点事件，通过对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深入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发展趋势。比如，从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具体案例看到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大趋势。再如，通过具体分析英国脱欧事件，不仅看到英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更揭示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复杂的互动。这种功夫需要研究者能在宏观视野和微观细节之间灵活转换，既能“由小见大”，也能“由大

<sup>①</sup> 《习近平：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中国政府网，2021 年 7 月 6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06/content\\_5622816.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06/content_5622816.htm). [2025-03-18]

及小”，真正看清不同国家的角色和意图。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带有“中国底色”，构建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回顾过去 200 年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英国的东方学和二战后美国的区域研究先后引领学术浪潮，其学术范式延续至今。今天，中国应以自身视角和经验，贡献具有中国底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新学科、新概念，但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并不陌生。许多学者都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他国的传统，如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到汉唐时期的《大宛列传》《西域传》《大唐西域记》，再到宋明时期的《诸蕃志》《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等。中国历史上研究他国的深厚底蕴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丰富的现代化经验，能够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提供支撑。

中国底色强调研究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觉，研究者应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运用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避免单纯套用或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中国在非洲开展农业减贫项目时，并没有简单套用西方的发展援助理论，而是基于中国乡村振兴与脱贫经验，用中国技术扎扎实实地帮助非洲国家。比如，中国在坦桑尼亚的姆贝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杂交水稻，明显提高了当地粮食产量，赢得了当地社会的高度认可。这种真正带有“中国底色”的实践才体现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意义，也迫切需要学术界主动构建出相应知识体系，摆脱一味跟随、模仿西方的传统。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建立“对方视角”，真正做到换位思考。对方视角是一种换位思维，就是设身处地将自己摆放在对方的位置，用对方的视角看待世界。运用在区域国别研究上，就是要真正理解对象国的处境、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摒弃高高在上的观察者立场，以平视的态度真正走进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语境，实现深入的理解和客观的解读。在此过程中，还需要研究者在交流中不断地进行主体和客体视角之间的灵活转换，防止陷入单一视角或文化偏见，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的片面性与自说自话，实现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有效互动与沟通，最终实现双方的理解和共识。<sup>①</sup>以印度研究为例，印度与中国虽为邻国，但两国的文明属性和社会形态截然不同。随着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中国对印度的宗教传统和发展问题并不能

<sup>①</sup> 刘鸿武：《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与推进路径》，载《大学与学科》，2022 年第 3 期，第 68 页。

“感同身受”，甚至多了些“傲慢与偏见”。因此，如何设身处地理解对方并与之开展有效对话，是区域国别研究努力的方向。例如，在中印文明互鉴研究领域，姜景奎教授通过跨文化比较范式，以儒家核心概念对南亚社会文化进行深度阐释。其研究发现，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进阶模式与印度教“四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理论呈现出文明路径的分野：“修身”与“梵行”的自我修持、“齐家”与“家居”的现世责任构成两种文明的共性基础，但“治国平天下”的治世理想与“林栖遁世”的精神超脱追求折射出两种文明对终极价值的不同定位。类似地，区域国别研究也应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才能在不同文明之间实现真正有效的沟通和理解，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

综上所述，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时代使命本质上是将全球性、本土性与主体间性三者辩证统一的过程。这一学科既需回应“大国之学”的战略需求，又需在文明互鉴中实现知识生产的范式革新。唯有通过全球视野的宏观洞察、中国底色的理论自觉与对方视角的伦理关怀，才能培育出真正具备“双向赋能”素质的区域国别人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 三 “身体在场”：以游学传统推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对象高度复杂多元，既包括语言文化、宗教历史，也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现实问题。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实践中，存在着学科过早理论化、基础知识生产缺乏、人才培养重文本轻实践等问题，导致研究成果难以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中国区域国别学要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中国底色和对方视角的人才，就必须把研究做到对象区域和国家的土地之上，而中国古代游学传统恰恰提供了一种“身体在场”的知识生成路径。中国古代的游学传统不仅是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文化理念。在先贤们的求学旅途中，行走、观察与思考构成了学习的基本模式。无论是孔子的周游列国，还是顾炎武、徐霞客的实地考察，这种重视实践经验的学术传统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知识获取方式。在当今全球化与知识体系多元化的背景下，这种游学传统对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一）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的内在契合：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

第一，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皆注重文本与实践的互动，知识获取逻辑

相同。中国古代游学不以纸上谈兵为学问终点，而是强调以行践知、以实证理。顾炎武在明亡后，北游提出“保疆卫国，非关书本”。他亲赴边地，考察地理军政之实，正是早期“田野调查”的典范。类似地，区域国别学不能仅依赖于西方学者或二手资料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而应结合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反思与重构。例如，非洲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呈现的“强人政治”与“权力分散”并存现象，往往难以用单一理论解释，唯有深入当地社会，才能理解宗教、族群、殖民历史等复杂背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深远影响。徐霞客对《禹贡》地理体系的实地修正，则展示了通过亲历得出的“纠错机制”。当前区域国别学中也面临“理论霸权”问题，西方的“民主转型”“现代化路径”等模型常被机械套用于非西方世界。中国古代的游学传统提醒我们：实地观察不仅是补充材料，更是对知识框架本身的修正过程。

第二，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皆强调与“他者”深度相处，跨文化理解路径相同。古代游学者在旅行中，不仅求知识，更接触异文化、异习俗，从而生发出对“多样性”的理解与尊重。玄奘在印度长达十余年的游历，使他超越对印度佛教教义的狭义理解，形成了跨文化比较的视野。这种深入“他者生活世界”的能力是区域国别学最为核心的人才素质之一。以中东与非洲研究为例，仅靠文献不足以理解部落社会在现代政治中的角色，必须通过生活在其中、与地方精英或普通百姓交往，方能理解当地的隐性规则。同时，语言浸入也是游学传统的重要一环。与今日课堂语言教育不同，古人通过长期在异地生活习得方言、俗语乃至文化语境。这启示我们在语言教育中应强化“非课堂”元素，鼓励学生进入对象国市井、农村等非正式场所，汲取真正的文化语感。

第三，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皆属于问题导向的学术生产，也是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中国传统学术长期以“经世致用”为导向，游学不仅是求知，更是为国为民之实践预演。顾炎武在游历中完成了对各地社会疾苦的调研，著《日知录》，形成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主张。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逻辑与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相契合。正如中国学术传统秉持“学以致用、尽心济世”理念，设立区域国别学的首要考虑应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需求为导向，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三大倡议”的落实，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实施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外交活

动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sup>①</sup>此外，中国研究者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兼顾考虑对象国的治理问题，为其提供本土化的解决思路。

## （二）以游学经验重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模式：在地能力的系统塑造

第一，推进从“课堂中心”到“在地中心”的培养模式更新。当前中国高校多采用“专业+外语”双轨制培养区域国别学人才，然而，其中“实地经验”往往被边缘化。参考古代士人的“负笈远游”制度，应倡导学生在对象国进行为期1~2年的连续驻留考察。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开展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是这一模式的典范，形成了4个“2+”和4个“+”的培养模式。<sup>②</sup>这种“深潜式”驻点有别于“走马观花”式的短期调研，有利于学生深入对象国社区、宗教场所、市场与家庭，构建立体化的在地认知。此外，朱熹、王阳明等人在游学中开坛讲学、与弟子论道，形成类似“师徒制”的学术共同体。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可借此模式，设立“田野工作坊”，由资深学者带队赴对象国，与学生共同完成调研、写作与反思，打造知识共创型团队。为保障游学实践的顺利开展，建议设立“游学导师库”，邀请对象国精英、中国外交官、中国企业驻外人员、在地侨领等担任顾问，为学生提供文化适应、安全建议与研究资源。同时，推动与对象国高校共建研究基地，设立跨境研究站点，打造博士生工作坊，充分运用两地资源，使得游学模式制度化。

第二，培养田野感知力、动态整合能力和实用技能。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在对象国面临的并非抽象模型，而是复杂、多变甚至充满矛盾的现实。一方面，需要高度敏感的田野感知力和较强的知识整合能力。比如，在印度种姓制度日益隐性化的今天，上到“种姓特留权”下到婚丧礼仪，仍是种姓制度的活跃体现。学生若不具备细致观察力，难以捕捉印度社会的真实逻辑。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在实地游学过程中同步推进文献学习、田野记录与理论建构，打破“先学理论后实践”的割裂路径，形成“读—行—思”一体化学习闭环。另一方面，需要危机应对能力的培养。古代游学者常面对战乱、流

<sup>①</sup> 陈岳：《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12页。

<sup>②</sup> 4个“2+”包括跨学科素养（精通2门以上学科）、深耕田野（2年对象国调研+1年访学）、双导师制（清华主导师+海内外导师组）、多语能力（英语+非通用语）；4个“+”包括地区与学科交叉培养，语言实践结合深耕田野，基础研究与议题创新并重，南北国家学术联动（发展中国家深度调研+发达国家理论对话）。参见姜景奎：《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问题——以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为例》，载《民族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第165页。

寇、瘟疫等不测环境，今日区域国别学者亦需具备跨文化冲突调解、卫生防护、法律应急等复合能力。例如在疫情、骚乱频发地区，如何保障自身安全并持续开展研究，是人才培养中不能忽视的环节。

第三，构建从论文到田野成果多样化衡量的评估体系。传统学术评估体系过于看重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忽视了区域国别学的实践属性。学术评估体系改革应降低纯学术论文的权重，鼓励学生基于田野经验产出民族志纪录片、社区规划方案、政策建议报告等新型成果。同时，应引入对象国本土专家的评价，构建多元反馈机制，避免“自我东方化”倾向，提升研究的在地性与可实施性，例如，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中国伙伴国建立共同的学术评价体系和研究构架。共同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能够摆脱西方学术霸权，夺回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学术成果的话语权，形成相互认可的学术共同体。

#### 四 结语

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被设立为新的一级学科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学界和公众对“他者”的好奇心，而是源于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事务背景下，对真实、具体、在地的区域国别知识需求日益迫切。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认知体系多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学术体系提供知识支撑，这种以西方为中心、以间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结构，在新的国际语境下已难以满足中国自身的发展判断与战略需求。在全球秩序深度重构、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今天，中国需要一种能够与自身国家利益、价值立场和现实关切相契合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机制。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问题，更关乎中国国家能力、对外话语与全球治理参与的深层次支撑。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全球与地区事务，承担起前所未有的责任和角色。这一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要思考以何种方式“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影响世界”，更要思考如何将这种认识能力转化为服务现实需求的知识产品。这不仅是对中国知识界的要求，更是对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和人民关切的回应。因此，区域国别学的发展需要切实回应好“四个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区域国别学不应只为满足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而应成为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重要抓手和思想源泉。

然而，从当前的发展状态来看，中国区域国别学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一定

的偏向。一方面，学术界更加关注体制机制的搭建，比如学术机构的设立、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以及各类学会的组建，着力于资源的整合与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与理论体系构建上，往往倾向于追求“统一性”“体系化”，希望尽早确立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学术范式。但这种过于追求抽象化、系统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高度经验性和情境化的学科，其最核心的生命力在于田野调查和基础研究。事实上，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与其急于求成，不如回归本源，从现实出发，优先解决当下最紧迫、最实际的问题。面对政策制定者与战略研究机构对高质量区域知识的强烈需求，区域国别学应当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为中国外交、经贸、安全等各个领域提供切实有用的智识支持。如果做不到“求全”，就应在“求精”上下功夫。只有在重点领域打造出一批能够真正服务于现实的优质知识产品，区域国别学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也才可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其学科价值。反之，若一味追求全面化，却忽视了落地性与实用性，恐怕会在历史的重要窗口期错失发挥现实作用的机会。

展望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能止步于书斋之间的纸上文章，更应走进世界各国的街头巷尾、田野村庄，贴近现实、深入人群，以真实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搭建起沟通理解的桥梁。区域国别学应当是一门实践的学问，真正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窗口、理解他者的钥匙、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

（责任编辑 黄念）